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第十九首试解

詹杭伦 沈时蓉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第十九首,本着“中和”的审美原则,对晚唐诗人陆龟蒙的诗作提出了“多愤激之词、少敦厚之义”的委婉批评,表示了元好问对陆氏诗作孤愤太多、怨气太重、未能得儒家温柔敦厚之道的偏激诗风的不赞成态度。

关键词:《论诗三十首》第十九首;“中和”的审美观点;元好问;陆龟蒙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6-0061-05

姚莫中先生在为刘泽先生所著《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以下简称《集说》)[1]写的《序言》中,曾将司空图的《诗品》与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作了比较,认为前者虽然玄妙、抽象、难懂,但读者可以通过主观去体会、去体味、去以意逆志,而后者虽然实在、具体、易懂,却必须通过客观地勾稽、考据、参订、论证,才能有所创获。笔者非常赞同姚先生的看法。《论诗三十首》虽然有了刘泽先生《集说》这样的集大成成果,但还不能说其中每首诗的注解都已经尽善尽美了,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仍然有着继续勾稽、考据、参订、论证,以求得正确理解的必要。第十九首便是一个显例。诗云:“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这是元好问评价晚唐诗人陆龟蒙的一首诗,诗下有作者自注:“天随子诗:无多药圃在南荣,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随春草斗输赢。”这一自注只是告诉我们,其诗的末句是针对陆龟蒙的

诗句发出的诘问,并没有透露出有关作诗旨意的明显信息。后人对这首诗旨意的理解,分歧颇大,从《集说》中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种主要的看法。

一曰“讥讽陆诗无益世教、脱离现实”说。此论由清人宗廷辅发端,后人赞同者最多。宗氏《古今论诗集句》:“陆鲁望生丁末运,自以未挂朝籍,绝无忧国感愤之辞,故即其所为诗微诘示讽。”陈湛铨《元遗山论诗绝句讲疏》:“遗山诗意谓陆天随应多孤愤之诗,而用此‘春草斗输赢’之作奚为!盖轻讥之,以为无益世教也。”郭绍虞《论诗三十首小笺》:“元好问论诗虽无家国兴亡之感,然就此诗言,知一般诗人之逃避现实、脱离现实者,固不为元氏所许矣。”刘泽《按语》:“第十九首意在借讽龟蒙的闲逸诗作,批评隐逸山林者的远离社会现实,无所作为。前二句诘责千古隐士的心怀孤愤无补于世,后二句微讽陆龟蒙的写诗只重身边琐事。”

二曰“借龟蒙以譬宋之遗民诗人”说。田凤

收稿日期:1999-10-19

作者简介:詹杭伦(1954—),男,四川荣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沈时蓉(1954—),女,安徽合肥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台《元遗山论诗绝句析评》：“余意遗山‘万古幽人在涧阿’一诗，或借龟蒙以譬宋之遗民诗人也。盖宋朝亡国，元人入侵，读书人尝到亡国之苦痛，一是卖身求荣，一则是积极与消极两等：积极者以身殉国，消极者遁迹山林，采取不合作主义，以求其心安。此宋之遗民情形。陆龟蒙在唐，或即后者一流，谓其全无孤愤，可乎？”

三曰“人世成败”说。何三本《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好问此首论诗绝句，并非论诗；而系论人者也。前二句谓万古幽人如陆龟蒙之类，因自视甚高，又遭时不遇，故虽身隐居于涧阿，而始终心怀魏阙，以致于幽郁终身；后二句谓人世成败犹如斗春草，输赢无须过分计较。”

但笔者认为元好问此诗旨意，既不是讥讽陆诗脱离现实，更不是用陆龟蒙来比喻宋之遗民，也与人世成败毫无关系。实际上，元好问是在批评陆龟蒙作诗孤愤太多、怨气太重，未能得儒家温柔敦厚之道，不符合“中和”的审美标准。元好问用“春草输赢较几多”来批评陆龟蒙，显然是采用的以小明大之法，既然陆龟蒙为了小事也要写诗计较，那么遇到其他更大的事，必然更要大动肝火了；而元好问对于陆氏这种“过犹不及”的偏激作风、诗风，是非常不赞成的。

元好问的这首诗在其著述中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要正确理解这首诗的旨意，应该遍考元好问的其他著述，全面了解他的论诗主张，从而总结出元好问对陆龟蒙的真实看法，经过这样一番深入细致的勾稽、考据、参订、论证，那么，这首诗的旨意也就会迎刃而解了。其实，解析此诗的钥匙就潜藏在元好问的《校笠泽丛书后记》中。其文云：“按龟蒙诗文如《丛书》与《松陵集》，予俱曾熟读。龟蒙，高士也，学既博赡，而才亦俊洁，故其成就卓然为一家。然识者尚恨其多愤激之辞而少敦厚之义，若《自怜赋》、《江湖散人歌》之类，不可一二数，标置太高、分别太甚、锲刻太苦、讥骂太过。惟其无所遇合，至穷悴无聊赖以死，故郁郁之气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廷争、埋轮叩马，则奋髯抵几，以柱后惠文从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谓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闻道，其大较然，非独一龟蒙也。至其《自述》^①云‘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则变

化，不一其体裁始则陵轮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之造平淡而后已’者，信亦无愧云。”[2]（卷三四）这段话既论其作品又论其为人，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批评方法。就其作品而言，首先肯定了陆龟蒙诗文有学博才俊、自成一家的长处，接着又批评其作品多愤激之辞而少敦厚之义；就其为人而言，指出陆龟蒙一生无所遇合，郁郁不平之气不能自掩，又设想即使让陆氏这种性格的人从政当位，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位法家者流的偏激之臣，无从实现儒家倡导的“中和”政治理想。可见，在元好问心目中，陆龟蒙是一位“工于文章而昧于闻道”的作家典型，他的作品以偏锋取胜，虽然自为一体，但有失中庸之道；用“无过无不及”的“中和”审美标准来衡量，他无疑是偏向了“过”这一端。读了这篇文章后，再来看那首诗，便会发现，这篇文章简直可以作那首诗的注脚。诗中所谓“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岂不就是文中对陆龟蒙生平的写照：“惟其无所遇合，至穷悴无聊赖以死，故郁郁之气不能自掩”；而诗中“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岂不就是文中对陆龟蒙诗风的批评：“识者尚恨其多愤激之辞，少敦厚之意”。可见，用元好问的文章来解析元好问的诗作，正所谓以元還元，丝丝入扣。

或许有人会对这种理解和作法提出质疑：《论诗三十首》是元好问28岁所作，《校笠泽丛书后记》是他45岁所作，怎么能用元好问晚年的文章来解释他早年的诗歌呢？刘泽先生在《集说》中引述了《校笠泽丛书后记》，认为这是“遗山晚年对陆龟蒙诗的评价有所改变”。笔者对这种质疑可以提出两条答辩意见。第一，元好问此诗、此文事实上并无早年、晚年评价不同的分别。元好问在《校笠泽丛书后记》中，叙述了他得书与研究的经过：“右《丛书》，予家旧有三本。一本是唐人竹纸反复写，元光间应辞科时，买于相国寺贩肆中；宋人曾校定，涂抹稠叠，殆不可读。此本得于闾内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赋》、《拾遗诗》、《天随子传》，而无《颜莞后引》，其间脱遗，有至数十十字者。二本相订正，乃为完书。向在内乡，信之、仲经尝约予合二本为一，因循至今，盖八年而后卒业；然所费日力，才一旦暮耳。呜呼，学之不

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为积年之负，不独此一事也，此学之所以不至欤？按龟蒙诗文如《丛书》与《松陵集》，予俱曾熟读。”这段话中，明确提到两个时间线索：一为“元光间应辞科时”，诸家年谱记元光元年（1222），元好问33岁，曾赴召至汴京。诸家未详此行的目的，据本文当是去应宏词科。可见他得到唐写本《笠泽丛书》时，距写作《论诗三十首》只有5年。另一个时间线索是“向在内乡”，按元好问为内乡令，在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时38岁。这期间他曾与麻信之（革）、张仲经（澄）相约，校定《笠泽丛书》。此时距他得到《笠泽丛书》的唐写本，也是5年。而8年之后，他在山东聊城完成《笠泽丛书》的校定，所花的时间，“才一旦暮耳”。在元好问亲自叙述的得书、校书经过中，没有提到陆龟蒙与皮日休唱和的《松陵集》，这说明他熟读《笠泽丛书》与《松陵集》，还在他得到《笠泽丛书》的唐写本之前。我们知道，元好问在写作《论诗三十首》的同时，还编有一部《锦机》，该书是“就李嗣荣、卫昌叔家所有书而录之”[2]（《锦机引》，卷三六）。很可能他当时熟读的陆龟蒙著作，就是李、卫二家的藏书。再者，元好问得书与校书的经历，还可以证实他对《笠泽丛书》少而习之，老而校定，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过程，看不出他对陆龟蒙其人其书的评价有早年、晚年的截然不同。第二，元好问在《校笠泽丛书后记》中所阐述的“中和”观点，在其早年即已确定。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元好问声称：“初予学诗，以数十条自警。”其中提到的“无怨怼”、“无鸷狠”、“无崖异”、“无炫鬻”、“无为坚白辨”、“无为仇敌谤伤”、“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低”等等[2]（卷三六），岂不就是《校笠泽丛书后记》中所批评陆龟蒙的“标置大高、分别太甚、镌刻太苦、讥骂太过”？在《诗文自警》佚文中，元好问所提倡的“要波澜，不要无畔岸”，“要感讽，不要出怨怼”，“要张大，不要似叫号”等等[2]（卷五四），也可视作对陆龟蒙诗风的自我警戒与规箴。其实，不仅在《校笠泽丛书后记》与《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对陆龟蒙的评价是一致的，而且在评论金代作家时，元好问也本着“中和”观点，把陆龟蒙作为“偏胜”一方的例证。如在《逃空丝竹引》中，他比较李汾（长源）、麻九畴（知

几）、杜仲杰（仲梁）三人的诗风说：“南渡后，李长源七言律诗，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高处往往不减唐人。麻知几七言长韵，天随子所谓‘陵陈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者，皆略有之。然长源失在无穰茹，知几病在少持择，诗家亦以此为恨。仲梁材地有余，而持择功夫胜，其余或亦有不逮二子者。绝长补短，大概一流人。”[2]（卷三六）显然，元好问是以李、麻诗风为一端，杜氏诗风为另一端来进行比较评论的，他认为前者胜在雄奇奔放、有气魄，失在无穰茹、少持择；后者胜在含蓄蕴藉、有涵养，失在气局不够开张、力度不够强劲；因此主张二者取长补短，进行“中和”，以达到更高的创作水准。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是以陆龟蒙诗风来描述麻知几诗风的，而“知几病在少持择”，不言而喻，陆龟蒙之失也当在于此。所谓“持择”，是持守和选择的意思，就是说要持守“中和”的理念，来选择和检束自己诗文的体格言辞，克服太放太露的弊端，做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不要一味地追求新奇豪放，而超出于道德规范与诗文法度之外。综上所述，元好问所持的“中和”观点具有审美标准和创作方法两层含义，就审美标准而言，它是指一种信守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诗歌风格；就创作方法而言，它要求调合两种对立的风格，双方取长补短，向中正平和的方向靠拢。

需要说明的是，元好问对陆龟蒙的批评，并不是声色俱厉的斥责，而只是一种委婉善意的“微诘示讽”。换言之，从总体上来说，元好问对陆龟蒙还是相当肯定的，他虽然不满陆氏过于愤激，不够敦厚，但对陆诗体裁的多样化及其冲决奔突的气势，仍然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在元好问看来，陆龟蒙作品尽管有些过火，但诗人如果能够达到陆氏的水平，便已理所当然地“自成一家”了，因此，他才常常用陆龟蒙来比喻自己朋友的作品。比如他为朋友曹通甫作的挽诗：“角逐文场早决机，晚年书卷不停披。诗如鲁望何多态，檄比宾王又一奇。题品自当高等级，搜求谁复尽毫厘。遗编缀辑非吾事，千古朱弦有子期。”[3]（《九日午后入府知曹子凶问夜为不能寐为作诗二首》之一，卷十）在这首诗中，他把曹通甫的诗作比为像陆龟蒙一样多姿多态，并认为“题品自当高等级”。这说明在元好

问的心目中,陆龟蒙诗作也应当是“高等级”的。又如元好问在为耶律铸的诗集作序时说:“有论诗者云:‘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其可谓尤难矣!前世诗人,凡有所作,遇事辄变化,例不一其体裁,乃欲与造物者争柄,囚锁怪异,破碎阵敌,陵辄波涛,穿穴险固者,尤未尽也。”[2](《双溪集序》,卷三六)他在文中先引僧贯休的诗句,指出作诗之难;然后引用陆龟蒙的话,指出即使操练到陆诗所达到的水准,仍然未能尽诗之妙。言下之意,也承认陆诗已达到较高的水准。再如在《陶然集诗序》中,元好问说:“诗之目既广,而诗评、诗品、诗学、诗式亦不可胜读,大概以脱弃凡近,澡雪尘垢,驱驾声势,破碎阵敌,囚锁怪变,轩豁幽秘,笼络古今,移夺造化,为工;钝滞、僻涩、浅露浮躁、狂纵淫靡、诡诞琐碎、陈腐为病。”[2](卷三七)他引用了陆龟蒙“破碎阵敌,囚锁怪变”这两句话,说明他是将陆氏放在天下工诗者的行列之中的,而“浮躁、狂纵”等诗病,陆诗也未能全然幸免。

综观元好问在著述中对陆龟蒙及其作品的赞扬或是批评,可以看出一个总的倾向:全都是就诗歌审美风格立论的,而且贯穿了一分为二的批评方法,并且严格执掌着无过无不及的“中和”审美标准,似乎全然未曾涉及到今之论者在讨论《论诗三十首》第十九首旨意时,所提出的“脱离现实”、“遗民思想”以及“人世成败”等问题。

“脱离现实”说的疏失,一则在于未能遍考元好问的著述,未能了解元好问对陆龟蒙的总体评价。此不赘述。二则在于未能多读陆龟蒙的作品,具体分析其作品的内涵和特色。陆龟蒙的文学著作本有《笠泽丛书》和与皮日休唱和的《松陵集》。南宋宝祐五年(1257),叶茵又合二书并增补佚诗佚文,编成《甫里先生文集》,其序云:“《笠泽丛书》、《松陵集》以篇计之,仅四百八十一。茵居其乡,诵其文,且和其绝句百八十余首。遂于文籍中裒集得一百七十一篇,合《丛书》、《松陵集》计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此书以流行者,聚于卷末,名曰附录,总为二十卷,刊置义庄。”今三书俱存,足资考证。其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辛辣尖刻的小品文,如《田舍赋》、《后虱赋》、《野庙碑》、《登高文》、《祀灶解》、《记稻鼠》等篇,讽刺

当时凶残的统治者及其百姓中的迷信思想,现实性非常强烈。鲁迅先生曾予评说:“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藪》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4](《小品文的危机》)二是即景咏怀的小诗,代表作如《新沙》:“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讽刺官家搜刮的触须无处不到。《白莲》:“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诗中“无情有恨”的白莲形象,实是作者人格的化身。元好问所引的“春草输羸”那首,出自陆龟蒙的《自遣诗》,诗题下有小序云:“自遣诗者,震泽别业之所作也。故疾未平,厌厌卧田舍中,农夫日以耒耜事相聒,每至夜分不睡,则百端兴怀扰人,思益纷乱无绪,且诗者,持也,谓持其情性,使不暴去,因作四句诗,累至三十绝。”可见这组诗是为排遣愁绪而作,而作者的忧愁实不能自掩,如其中的一绝云:“数尺游丝堕碧空,年年长是惹春风。争知天上无人住,亦有春愁鹤发翁。”这种触景而生的愁绪,正是作者“百年孤愤”心境的写照。有人认为,元好问所讥讽的只是陆龟蒙的闲适诗作,而这些闲适诗是不具有现实性的。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自遣诗》便是所谓闲适诗的代表作,但其中实弥漫着浓厚的“孤愤”情绪。这种“孤愤”情绪产生于作者对当时现实的强烈不满,正是所谓“短章大篇,往往间出,谏讽怨满,时与六义相左右”(陆龟蒙《和过张枯处士丹阳故居诗序》),这样的诗作当然也是具有现实性的。元好问对其诗作不满之处,实际上并不在其是否具有现实性,而在其伤谗疾恶、愤世疾俗,怨气太重、辞锋太烈,“多愤激之辞而少敦厚之意”,因为元好问是主张“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的(《杨叔能小亨集引》)。陆龟蒙的第三类作品是夸大斗险之作,包括元好问所指出的《自怜赋》、《江湖散人歌》之类以及与皮日休反复唱和的长达千字的大篇。对这类作品,元好问一方面肯定其“陵辄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的雄劲气势,另一方面亦不满其“少持择”的作风。明人胡震亨评陆诗“多学为累,苦欲以赋料入诗”[5](卷八),清人翁方纲评陆诗“渐开松

浮”[6](卷二),他们的意见同元好问是一致的。

“借龟蒙以譬宋之遗民”说的疏失,主要在于未能弄清《论诗三十首》产生的时代环境,这组诗题下有小注:“丁丑岁三乡作。”时当公元1217年,元好问28岁。固然今之论者有“元好问《论诗绝句》非青年之作”之说,但远非定论^①。况且,即使《论诗三十首》晚年有所改定,也要弄清楚元好问晚年关注的是金朝的遗民而非宋朝的遗民,他绝不会用陆龟蒙来比譬宋之遗民的^②。

“人世成败”说的疏失,在于以为元好问此首《论诗绝句》只系论人,而非论诗。按元好问在《诗文自警》中明说:“人品凡劣,虽有工夫,决无

好文章。”[2](卷五四)在他的观念中,人品与诗品是密不可分,在他的文学批评中,论诗亦是论人;论人亦是论诗,绝无分论之可能。在《校笠泽丛书后记》中,他由陆龟蒙的诗文风格推及其为人,便是无可辩驳的明证。再者,若要论及“人世成败”,往往需要批评家有亲身经历,然后才能有感而发。而作《论诗三十首》时,28岁的诗人血气方刚、意气风发,“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金史》本传)。方思大有作为,何来“人世成败”之感?故其说亦不足信。

注释:

①指陆龟蒙自作《甫里先生传》,载《笠泽丛书》卷一。

②参见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系青年时作》,载《晋阳学刊》1990年5期。

③关于元好问对金遗民的态度,可参见詹杭伦著《金代文学史》第五章第二节《流落异代的金朝士人的走向和心态》(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

参考文献:

[1]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元好问.元好问全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施国沂.元遗山诗集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翁方纲.石洲诗话[M].清诗话续编[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Explanation of Yuan Haowen's *Lun Shi Shan Shi Shou* No. 19

ZHAN Hang-lun, SHEN Shi-rong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ly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among scholars in understanding *Lun Shi Shan Shi Shou* No. 19 by Yuan Haowen, a literary figure in the Jin dynasty.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Yuan Haowen criticism, we put forward with strong evidence from Yuan's works that, the exact purport of the poem is to tactfully criticize the poems by Lu Guimeng, and express his disagreement with Lu's extreme style, based on his "balanced" esthetic principles.

Key words: *Lun Shi Shan Shi Shou* No. 19; "balanced" esthetic viewpoint; Yuan Haowen; Lu Guimeng